

【思想文化】

论清末民初的“新国民”思潮

车冬梅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眼光从器物、制度的维新升华思想文化心理层次上,出现了一股“新国民”思潮。“新国民”思潮以求国、立国、建国为线索,以确立爱国主义为宗旨,给今天的“新国民”思潮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有益的启示,促进了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关键词:“新国民”思潮;国民性;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3-0005-04

New-style Citizen thoughts from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E Dong-mei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s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crisis, Chinese scholars, who are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modern enlightenment, transfer their views from reforming social-system to exploring the issue of national diathesis, which leads to the New-style Citizen thoughts—a new thought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In conclusion, the New-style Citizen thoughts is in purpose of saving, establishing and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 Patriotism is its aim. It is an influential phase in the modern history. And it makes us develop materi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spiritual one, and adds new content to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historical situation. All in all, the New-style Citizen thoughts not only looks back to history; but also concern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t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establish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style Citizen thoughts; national character; new type of citizen;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层面开始出现裂痕,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从不同的层面上认识西方文明,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和现实命运。随着认识的深入,他们将目光放在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差距上。由此,作为精神文明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进入学者们研

究反省的视野,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所谓“国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人”,相当于现代意义的公民。而对于“国民性”的解释,并无确定,学者也各抒己见。概括地说,指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国民的思想觉悟。改造国民性即培养具有好的国民性的新型国民。因此,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也可称为“新国民”

收稿日期:2003-07-21

作者简介:车冬梅(1975-),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讲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思潮,而且此处“新”的概念是近代的,不仅是与“旧”相对的形容词,更有培养、创造、塑造的含义,具有开拓意义,所谓“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1]由此可见,“新国民”社会思潮是清末民初兴起的,对国民性反思与重建的思想文化深层启蒙运动。

一、“新国民”思潮的历史背景

(一)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空前境地。“中国的形势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是在不断恶化,国家的独立受到严重的威胁,西方国家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索勒得越来越紧。”^[2]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使学者们慨叹道:“国之不振,谁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为傀儡者,岂独一国而已?全国关税,握于人手,关道关督,一傀儡也;全国铁路,握于人手,铁路大臣、铁路公司,一傀儡也;沿江厘金,握于人手,委员一傀儡也;洋操训练,握于人手,将弁一傀儡也;无端而胶州割,无端而旅大割,无端而威海、广湾割,无端而海门湾又将割,土地之权,一傀儡也;一言而刘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权,一傀儡也。”^[1]时局的严重压迫,使他们的思维方式真正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开始思考人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当今诸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国家间的竞争,而是国民间的竞争,是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而与他国竞争,再加之国民力是诸力中最强大的,^[1]所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3],“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4]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学者们将国家的命运与国民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国民只有改变自身,提高觉悟,才能拯救国家,才能使国家日益强大。可以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刻变化。”^[2]由此可见,亡国的危机刺激了中国的发展,刺激了中国学者们的思索,是促进“新国民”的诱因。

(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纵深发展

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失败及丧权辱国的条约,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震荡、分化和改组,形成了近代中国面向世界的现代化高潮。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走过了从追求坚船利炮到西艺西政的坎坷历程,学者们最终意识到国民性才是对民族前途影响至深的问题,从而提出:“国也

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能犹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这表现出学者们从物质上的引进到制度上的模仿,已经从惨痛的失败中总结教训,进而深入到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以铸造新型国民而使中国早日走入现代化。可见,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已经随着历史的脉络,经历了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进入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深刻的心理层面,终于抓住了关键所在:人的现代化。这既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而且随着西学的引进,他们能够吸收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在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与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上的某些合理成分,超越了封建社会的治民策略,意图使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转化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

学者们用所接受的西方各种思潮,运用于中国实际问题之中。严复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又翻译了多部西方著作,并将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运用这些理论构筑起新的思想,指出“均是人也,或贵焉,或贱焉,或滋然而日富,或塌然而日贫;……无他,贤不肖智愚勤惰异耳,谁非天赋之权力也哉?……吾闻亚里斯多德之言曰:人生而奴,此诚诚辞,顾以比卢梭之言,犹为近耳。”^[4]并且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有机体论”。他根据这种以“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得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乃是中国积弱的“总因之重大者”,所以中国欲图振兴,必须“新民”。于是“天演”风靡,人人皆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为优,不适为劣,天演之公例也。以我与西人较,我主彼客,其位异;我守彼攻,其势殊。虽无必胜之方,却有不败之理。而竟不然者,则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彼以适于今日而占优胜,我以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故耳。是使吾人负兹重戾者,又吾人之性质、之行为阶之厉也。”从而“居今日而曰救亡,而曰偿罪,其唯改良思想之一法而已。”^[5]可见西方启蒙思想促进了学者们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加速了“新国民”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二、“新国民”思潮的总体特点

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就开始用道德的感化作用引导人们或用势位与权威的力量确保人民服从。近代以来,专制统治受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渐入,新一代学者所倡导的“新国民”以培养新的有德性的人民为目的,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首先,“新国民”思想具有以救国、立国、建国为线索,以确立爱国主义为宗旨的特点。中国的伦理观念中渗透着祖先崇拜、尊重传统、注重家庭等因素,而这种观念阻碍了中国人独立自主意识的发展,甘愿处于服从的角色。于是,学者们首先鼓动人民进行家庭革命,为政治革命奠定基础。他们认为“中国今日不可以不革命!中国今日家庭不可以不革命!”因为“我中国二千年来,家庭之制度太发达”,“以故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以致“尔欧洲之民,扬大旗,擂大鼓,呐大喊,顺风扬帆,满载民族帝国主义,乘潮流以入中国,张目皇皇大搜大索,而与夫中国无帝国之民族遇,是尚得有国哉!是尚得有家哉!无家无国,是尚得谓之国民哉!是故欲革政治命,先革家族命。”^[6]而且,他们还明确的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7]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休戚与共。这实际上是指明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民”从“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投入“国”的怀抱,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当“国民”的概念明确之后,就可以要求“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陆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4]为树立“国”在国民心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还极力强调国民应该具有公德心、责任心、自觉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等等。可见学者们讨论国与家的关系,探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的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思想,将爱国主义“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5]

其次,“新国民”思潮的表现形式以批判旧国民性及陋俗为主。学者们确定了“新国民”的基本宗旨之后,就如何进行这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展开思

考。在接触到西方民族文化之后,学者们首先想到运用中西对比的方式对中国积弊很深的国民性进行揭露。如严复在文中分析“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4]。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渐渐不满于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对照,而是直抒胸臆,认为中国人是无自由、无思想的奴隶,既无自主性,又无自立性,他们还要求对阻碍人们进步的旧风俗挥动利斧进行砍削,陈独秀连续而有系统地写了题为《恶俗篇》的五篇文章,集中攻击了中国“恶俗”。的确,中国风俗中有相当的部分成为引起社会失调的社会问题,如缠足迷信等等。孙中山就曾在民国建立之际申告天下,希望民众为保家护国能“束修自好”,“屏绝恶习,共作新民”。^[7]最值一提的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挖掘与剖析。鲁迅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的批判互相映照,通过揭示中国人麻木、愚昧、懒惰等种种弱点,既而深入到历史与现状中去揭示国民性弱点的劣根所在,使人们对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把握。总而言之,学者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在近代中国殆于灭亡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强精神的产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后,“新国民”思潮以宣传与教育为改造国民性的主要手段。“新国民”思潮以宣传与教育为主要手段,认为拯救国家“要从普及教育入手”。因为他们觉得“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8]的确,教育,尤其是集德育、智育、美育、体育一体的完美教育,一方面可以向个人传递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打开人性发展道路,指导人在活动中遵循一定的要求。个人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才能清楚了解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一分子必须掌握的行为准则,才能建立相应的价值体系,成为具有良知的有人格的人。学者们也正是看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才会对教育寄予厚望,“但使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4]而学者们主要通过学会、报纸等宣传方式进行普及知识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近世国家的基础必须筑造于国民的精神之上,所以大力向国民传播文明思想为首要之计。因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所以“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9]一语道出了中国古文

及文法对中国人开通风气、培养智识、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其次,他们认为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应以报纸之多少为准,民智之开闭,民气之通塞,每根于此,而报纸将“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1],实为国民的向导。因此,白话报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语说出来,让天下的农工商贾妇孺都能明白,以此启发中下层社会,唤醒国民意识,焕发全体民力。所以在清末约140份白话报与杂志中,多以普及知识开启民智为宗旨,这在陈万雄所著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有详细的介绍。总之,学者们面对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培育出的愚昧麻木的人民,面对民族危亡,运用所能运用的方法培养国民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其目的是为了振兴国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端,反映了时代主题,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三、“新国民”思潮的启示

“新国民”思潮反映了先进中国人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爱国爱民的新思路,它通过探讨国民性、国民素质以及国民与民族、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实现国家的强大,关键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具有的体魄、智力、思想道德的总体水平,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人的现代化进步的基石。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建立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邓小平同志首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并将它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10]当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性发展之时,一部分人的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空虚

了,同时在极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了思想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致使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渐渐地,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两手抓,两手硬。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1]“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而且“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全社会通过共同努力,振奋民族精神,确立共同理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与国家实力的增强。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2] 古德诺.解析中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 [3]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16.
- [4] 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张木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Q].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 [6] 张木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Q].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7] 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9]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J].近代史资料,1963(2).
- [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杨彬智]